

一位日本旅行者的中国公益路

“需要我的地方我就会出现”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我叫河原启一郎,日本人,现正计划环球骑行之旅,中国是我的第一站。在这里,我经历着中日之间最敏感的时期,也感受到地震等灾害带给中国友人的伤痛。在生活中我是一名旅行者,也是一名公益行动者,我认为在旅途中能帮助别人旅行才会更有意义。”10月16日,在腾讯燕山大讲堂上,河原启一郎对在场的听众说。

2012年夏天,一名日本游客在武汉游玩时自行车被偷,三天后被迅速找回。这则新闻瞬间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很多人都认识了这位骑着自行车环球旅行的日本人河原启一郎。

9月,在彝良震后救援中河源启一郎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再一次将他拉进了公众视野,尽管有很多人理解他的行为,但他依然作为一个“公益无国界”的实践者而特立独行。

日前,他来到北京,向在场的听众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故事。

让自己更像中国人

云南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湖北武汉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9月8日晚上,在友人家中看电视时知道云南彝良地震了,我就准备启程前赴灾区。但由于之前已经答应为河南南阳一所高校做公开演讲,所以并没有马上到达彝良灾区。而是按照计划,10日从武汉出发,12日抵达南阳高校演讲,再从南阳到西安、贵阳,这一路上募集到了约80公斤的灾区必需品,像药品、衣物、食品等。

同时在贵阳还等到一位从越南过来的日本朋友,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位环球骑行旅行者,曾经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我们有着共同目标——去彝良救灾。

我在微博上写了两条日志。第一条,去年三月份日本东部大地震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



河原启一郎和他失而复得的自行车

家志愿者都前来提供帮助,“现在是轮到我们来帮助的时候了”;另一条则是,“现在我将乘坐46小时火车前往贵州,然后前往灾区救援”。

9月16日晚,我和朋友去吃晚饭,途经一家台球厅时被一群青年人认出我是日本人,并开始起哄。

我和中国朋友被围堵在饭店门口,刚刚起哄的那些年轻人说要打我,我的中国朋友帮忙解围但那帮人似乎并不肯轻易善罢甘休,最后还是在朋友母亲的帮助下我才脱困,还好当时并没有怎么受伤。后来我得知这群人,并不是很好的年轻人。

说实话,经历这件事后,我有些哀伤,但没想过要放弃。当时我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沿路募集到得东西送到灾区。

只是事后我对自己加强了保护,首先是改变一下装束,不再一味地戴着发箍,裤子也不再是我平常的那种宽松肥大的,出门时尽量少说话。还有些中国朋友给我支招儿,使我看上去更像是一名中国旅行者。

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其实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朋友,都是非常

好的人。在我微博上,也不时会有网友留言表示关心或者致歉,他们说:“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请保护好自己。”

我很感激这些理解我、支持我的朋友。

我在救灾现场

到了灾区之后我才发现,现场情况要比我之前想象的严重,彝良的道路已经完全坏掉,好多地方车、人都不易通过,当地没有人力,也没有物资,灾区到处都是倒塌房屋和震裂地带,村民们都住在急救帐篷里。我作为志愿者去帮助他们清理淤泥、包扎伤口、发放物资。

在日本,灾害发生后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进入灾区,这些组织很有次序,救援侧重点也不一样,民众只要是想进入灾区参与救灾,都能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组织。

在彝良,我找到了一个专为民间志愿者提供指导的工作站,这是由壹基金救援联盟联合其它几家民间组织共同成立的。我觉得这个小站就像是民间力量在灾区的主心骨,集合着各种来自大家的正能量,通过工作站把

各地不同的物质汇聚起来,有序发放到灾区去。另外工作站靠近灾区,方便采集灾区信息,及时把信息放到网上、传到外面。

最初站内有250名志愿者,后来只剩下30个,并且都只能在站内做运输,因为灾区仍然存在危险,所以普通志愿者是不能到一线救援的。

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在前方工作,同时也可以在后方便进行信息支援。但是我总是感觉一个人的力量太微薄、太渺小。于是,我通过自己的微博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了解彝良的灾情,影响更多的人,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寄送物资、药品,而这正是我想要看到的。

在我离开工作站后,仍然通过微博号召大家捐出一些实际装备等物品,我将这些装备物品都转给了工作站的同事,希望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

对于募集来的物资,我不太喜欢捐赠人直接捐钱,因为这样有可能到时候说不清楚,我倒愿意接受一些实物,衣服、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如果要是有人捐钱,我也会将这些钱全部买成物品。

每一个捐赠人捐赠物品时,

我都希望和他照一张交接时的照片,我会将照片带到受助者身边,当面告诉他就是这个人帮助了你,你一定要记得。

这种感觉很好。总之,中国不是有句古语么,叫“金钱是万恶之源”。

离开也是无奈

本来计划在灾区待上半月至一个月,但没想到三天后就回到了北京。

在当地待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想做的很多事情变得困难起来。这可能是普通的志愿者体会不到的。

我去商店买水,老板听我说日语就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确认后他便说:“我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卖你东西,你走吧。”

其实救援人员和我在一起时是很友好的,我们甚至一起清淤、一起搬动大块落石。但我也能感觉到当地相关部门的一些为难。可能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

比如,假设我在彝良不被欢迎甚至受到攻击,就可能被媒体报道,那么日本国民肯定会不高兴。这反而会当前两国关系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跟当地部门沟通后说“我干几天就走”。

几天后,我很遗憾离开彝良震区。但我仍然记得,在震区时中国友人对我的帮助,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记得我在杭州时,甚至有些记者朋友专门在我身边,他们不为采访就为保护我的安全,让我很感动。

我打算24号再去云南昆明,不一定会去灾区,但只要灾区需要我,我就一定会出现在那儿。

做公益不一定要加入某一个组织,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公益,当你被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出现,这就是我的态度。

社工人物

于海波:为社工专业学生插上翅膀

于海波,1970年出生,因患先天性脆骨症身高仅有86公分。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羸弱纤小的身躯中,竟蕴含着无比巨大的能量:1995年5月,坚强的她开通为残疾人服务的心语热线;1996年8月,她创建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累计接听服务电话36000余人次,回复信件7600多封,热心助人多达数万人;经她呼吁和募集,使2500多名特困孩子得到助学金160多万元,41名残疾人获得捐赠电脑、轮椅;22名孤寡老人得到长期义务照料,500余名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获得职业技能培训,400多名单亲家庭及农民工子女获得心理援助。她因此荣获中国青年志

愿服务奖、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学习雷锋先进个人、中华慈善奖等多项殊荣。

2003年5月,在北京参加颁奖活动的于海波得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正在酝酿一项面向民间组织负责人的专门培训。9月,她走进中青院,在来自全国15个民间组织的学员中,她是身体残疾最重的一位。在一位大姐的协助陪读下,于海波不仅坚持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专业社会工作课程,而且利用周末策划了一次有残疾人和志愿者参加的“心之语”社会工作主题实践活动。

2005年,于海波创办的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成为中国社会

工作教育协会在东北三省唯一的民间组织社工实习基地。基地主要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硕学生提供专业实习课程,设置了丰富多彩的实习内容,让学生在丰富自身理论操作技能的同时强化对专业课程的认知。

黑、吉、辽一些高校了解“长春心语”的情况,陆续安排学生前来实习。据统计,已有东北三省11所高校201名社工专业的实习生在“长春心语”完成了专业课实习,其中本科生196名,硕士研究生5名。于海波在搭建起社工学生实习平台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协会自身建设,利用高校社会工作教学优势和师生智力资源,她已经累积了覆盖

20多门志愿者培训课程的档案记录文件近百种,总结了不同领域社工实务经典案例近百个。

“长春心语”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培训体系:以“打造优秀基地,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根据不同年级、各专业课程的特点,结合协会服务领域以及服务对象特征,不断创新实习课程。2011年5月至7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三的社工专业学生,在“长春心语”实习期间,在协会指导老师的支持下,组织近百名残友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互动联谊活动,过程中运用“同理心”、“团体治疗”、“小组工作”等社工知识,使学生们在运用专

业知识和理念进行操作的同时,增加了自身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通过与残友的互动交流,学生们对帮扶对象有了全面了解,对自身定位、社工价值以及专业发展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2012年3月28日,中国社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来到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他打开装满学生实习资料的卷柜,翻看一本本装帧质朴、记录详实的档案感慨万千,称于海波为我国社会工作实务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长春心语”不愧为深受欢迎的优秀社工实习基地。

(作者:长春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唐天正)